



【锐眼看市】

印度在迈向发达国家的旅途中的确存在不少障碍,其中作为其最大优势的“人口红利”可能蜕变为最厉害的要素劣势。准确地说,人口红利除了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因素外,还应包括人力资本内容,且后者更突出人口资源效率与增值的目标驱动,而就当前印度而言,人口红利中的人力资本成色显然不足。

印度走向发达国家面临多重挑战

张锐

印度总理莫迪前不久于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时,不仅再一次高调宣称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而且自信满满地表示印度将成为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引擎。按照莫迪先前设定的经济发展目标,2025年印度将成为一个经济总量达到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2032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至2047年印度独立100周年时,印度将成为一个发达国家。愿景看上去的确宏大与诱人,只是可能任何一个阶段目标的实现均非易事。

莫迪自2014年执政,5年后获得连任,截至目前的九年时间实现GDP年均实际增长5.3%,名义增速超过10%;更重要的是,在莫迪治下,印度先后超过法国和英国,去年以3.4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晋升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3年印度GDP达到3.73万亿美元,而且接下来印度经济的确存在可以继续高增长的潜力与后劲,其中“人口红利”的持续可以说是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优势。数据显示,印度是目前全球第一大人口国家,人口总数达到14.25亿,印度政府预测,到2036年本国人口将增至15.22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指出,本世纪60年代之前印度人口将持续保持增长至17亿,而印度的“人口红利”优势不仅仅体现在数量规模上,其人口中位数年龄目前仅为28岁,25岁以下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一半,35岁以下人口约占总人口的60%,因此比较看来,印度是

全球范围内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

充足的人口与富有弹性的人口结构不仅可为企业提供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从而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与提高竞争力,同时能够培育出强大的消费市场,进而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未来10年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达10亿,同时标准普尔预测,到2031年印度消费市场将从2022年的2.3万亿美元飙升至5.2万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巨大的人口优势还吸引了跨国公司的纷至沓来。数据显示,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实际利用外资从2013年的243亿美元上升到2022年的710亿美元,涨幅290%,FDI(外国直接投资)累计流入量超过9600多亿美元,印度的全球营商环境从2013年的142名上升到去年的63名,受到影响,苹果、特斯拉以及三星等全球行业头部公司纷纷在印度安营扎寨。

与跨国公司集群进入的阵容相辉映,印度本土产业也摆开了较为强大的竞争力矩阵。印度的仿制药驰名全球,其药品产量目前位居全球第三位,疫苗产量占全球60%,同时印度的航天航空技术和电子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在世界排名也位居前列,前不久作为全球第一个登陆月球南端的探测器,月船3号探测器的成功登月再一次让世界见证了印度航天技术的非凡,此前10年印度就在亚洲第一个将卫星送入到了火星轨道。另一方面,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目前印度的服务业占比超过了60%,产业结构层次水位较高,背后的核心支撑就是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与软件产业,而作为全球最大的IT服务和

软件外包国,印度占据了世界软件外包市场的60%。

立足于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领域沉淀出来的强大竞争力,印度政府正在聚力推进数字产业,计划未来五年内推出超过100项数字化变革项目,对此,2023/2024财年准备投入10万亿印度卢比以支持数字科技初创企业,同时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免税上限率、变动征收豁免规则以及降低特定进口产品关税等措施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项目的创建与发展,而一旦数字转型成功,对于接下来“印度制造”的全面布局与最终崛起将起到十分关键的武装作用。

由于国内产业结构中印度制造业仅占10%,在全球的占比更是至少3%,莫迪自上任开始便提出了“印度制造”计划,目的是将制造业产值提升至GDP的25%。为此,莫迪政府一方面不断提高消费电子等进口产品关税,前后涉及的产品多达4500多个品类;另一方面,最近两年印度政府不断推出了智能电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的进口禁令,同时出台巨额财政激励计划吸引境外相关厂商到印度投资建设,而对于本土初创制造业企业,印度政府不仅给予税收优惠与奖励,甚至连其参加国际商务活动的机票也给予报销。看上去印度政府所作所为的确有些不对劲,但通过一系列骚操作,印度实现了电视机100%的本地组装,同时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国,其国内智能手机消费存量的九成以上来自本土制造。

当然,预测只是一种主观推断,排除金融危机、新冠疫情以及自然灾害等各种不可抗拒事件姑且不论,印度在迈向发达国家的旅途中的确存

在不少障碍,其中作为其最大优势的“人口红利”可能蜕变为最厉害的要素劣势。准确地说,人口红利除了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因素外,还应包括人力资本内容,且后者更突出人口资源效率与增值的目标驱动,而就当前印度而言,人口红利中的人力资本成色显然不足。一方面,印度成年人口数量高达2.8亿,现有劳动力人群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数只有14%,正式技术工人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更是低至3%,总体劳动力素质偏低势必影响企业创新步伐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印度人口生育率已从高峰时期的5.3跌至目前的2.1以下,而且印度政府预测未来15年内青年人口(15-29岁)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呈现“先增后减”的态势,同时老年人占比将升至14.9%,因此不排除印度未来会遭遇如今许多国家所面临的人口抚养比上升以及老年化压力。

结构性失衡是印度经济肌体内的一大硬伤。一方面,印度农业不仅在基础设施上严重滞后,而且频繁受到自然灾害的袭击与损害,而农业部门又吸收了全国45%的就业人口,二元经济结构持久得不到显著松动,不仅大量劳动力人口沉淀在低端产业中,而且农业也难以得到因人口转移而形成的先进要素辐射。另一方面,虽然服务业扮演着印度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制造业凸起需假以时日,工业方面的巨大断层强烈抑制了可以进一步吸纳劳动力人口的就业张力,由此导致了印度国内失业率常年保持在7%以上,城市青年失业率超过20%更成常态。但问题的关键是,有更多的失业人口被抛向市场,本已不轻的贫穷化程度也会愈

演愈烈,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印度处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口为7.8亿,同时还有2.28亿的绝对贫困人口,占比为世界最大,而只要贫困的存在,就必然拖累经济增长的正常步伐,甚至会成为干扰与阻碍经济成长进度的巨大风险因素。

寡头经济是刻印在印度经济体上的一个鲜明标签,令印度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广泛诟病。目前包括信实集团、阿达尼集团等国内六家巨头企业把控了印度25%的港口产能、60%的水泥产量、33%的钢铁产量、60%的电信用户以及超45%的煤炭进口控制权,巨头公司能够引领大型突破性项目,但产业的高度集中更容易扼杀竞争,导致更加广泛的私人投资容易被挤出,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持续处于式微状态,市场的竞争活跃度受到极大压制。更为重要的是,垄断财团扩张的背后还有印度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统计数据表明,过去10年间,印度创造的财富40%流向了1%的人口,只有3%的财富流向了底层50%的人口,印度目前最富有的10%的人控制着该国80%的财富,而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印度58%的财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贫富悬殊还与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宗教因素紧密关联,而且后两者的影响力已根深蒂固,意味着印度贫富差距鸿沟难以弥合,可贫富悬殊的板结又会降低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力以及撕裂执政者的国家治理能力,于是,包括莫迪政府的“废钞令”引来社会混乱、农业新法遭遇农民集体抗议等风险事件频繁上演,经济肌体由此反复承受的痉挛与阵痛不言而喻。(作者系经济学教授)

多元支付助力金融服务更加包容

盘和林

创新不仅是金融生态体系活力的核心驱动力,更是金融领域持续发展与繁荣的关键因素。在全球疫情对经济造成深远影响的背景下,金融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是构成经济体系的基础框架,而且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战略导向作用,这种战略导向性使金融创新成为了经济前行的指南针。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金融创新的概念具有广泛的多维性,涵盖了从金融业态和金融产品到金融治理机制的多个层面。在这些广阔的金融创新场景中,“多元支付”便是一个典型且极具示范效应的典型案例。

在过去几十年中,金融支付领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革新。从粮票和布票的物物交换,演变至现金交易,进而到信用卡和借记卡消费,直至如

今的手机支付,甚至是数字货币,支付方式的多样性在不断丰富,消费手段正变得越来越高效与便捷。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跨境支付呈现出显著的增长势头,数字技术的飞速进展成为了推动这一突破性发展的关键动力。

在数字时代,多元化的金融支付方式不仅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而且逐渐转变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这种多元化不仅提供了更多的便捷性和选择性,还有助于解决不同消费群体面临的特定金融需求和挑战,从而增强金融系统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值得一提的是,便捷支付在国际旅游和跨境教育领域展现了显著的优势,不仅降低了个体的交易成本,也提升了生活质量和社会参与度。这种便捷性和效率让个体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个人目标,从而全方位地提升了便捷支付

的综合价值。

尤其是随着跨国供应链的拓展和境外旅游、海外留学及移民的增加,跨境零售支付需求日渐增长,跨境支付服务的需求持续上升,急需连接国内外支付差异和满足不同支付需求的关键工具。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银联的全球银联卡不仅方便国内人境外消费,也让境外人士在国内进行无障碍支付和现金提取。对国际旅游者而言,这种便捷支付优化了跨境费用管理,降低了货币兑换成本,并提供了实时汇率与费用明细。这不仅提升了用户体验,还将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 and 就业机会创造。此外,便捷支付为国际留学生提供了优化的跨境金融管理机制,显著降低了与汇款延迟及额外交易成本相关的经济压力,从而有助于提升其在异文化环境中的整体适应性和学习体验。

当然,多元支付不仅体现在支付方式的多样性上,更进一步体现在无障碍、包容性金融交易上,这不仅是技术和金融创新的里程碑,也是金融行业走向更加包容和灵活的重要一步。从现实情况来看,包容性支付不仅是新兴支付技术的响应策略,更是解决金融不平等和排斥问题的关键途径。尽管跨境支付流程的复杂性和透明度问题仍然影响客户体验,这些挑战常常导致消费者在进行跨境交易时感到困惑或不安,缺乏对支付过程的全面了解,但“银联方案”为境外用户提供了多重优势。这些优势包括无额外成本,与境内银行卡消费费率一致;应用场景多样,通过手机实现全方位支付;以及更完善的隐私保护,仅需在本地机构完成身份验证,无需向第三方提供敏感信息等。

因此,多元支付不仅革新了支付

模式,也为消费者多样化的选择和全球金融可持续发展铺平了道路。然而,多元支付模式不无挑战,尤其在支付安全性、个人隐私保护和数字鸿沟方面。因此,政府、监管实体和相关行业需联合努力,以确保数字支付的安全性和效能,进一步确立其可持续和安全的发展轨迹。具体而言,通过创新旅游领域的金融产品,如分期付款、小额消费信贷以及先游后付等消费金融方案,不仅可以加强金融产品的合规性和公众教育,还能增强在线旅游平台的金融支撑和消费拉动能力。同时,提供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旅程的一站式服务,有助于将金融服务无缝地融入旅游的非金融环境,从而实现产业的全面优化。

(作者系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禀赋视角下的工业革命

郑磊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农业经济不发达的欧洲,而不是已经到达农业时代生产力巅峰的东亚,这是经济史学者一直没有彻底解决的疑问。从“大分流”开始,人们对荷兰、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英国、德国、美国等进行了细致的国别研究,试图找出一个能够取得共识的答案。维拉·扎马尼《欧洲经济史:从大分流到三次工业革命》聚焦在三次工业革命,从这三百年来的经济增长轨迹论证了一个观点,即工业革命源于欧洲文化,该文化崇尚自由、正义与博爱,并通过法治限制了权力的滥用,通过竞争打败了寻租和垄断。

作者围绕各国自然资源、区位、气候等自然条件,并从制度和经济政策等角度,对比了欧洲各国在工业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表现,指出在特定自然禀赋下,制度和经济政策对各国工业化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正如多数学者已经得出的结论,易于开采的英国煤矿和铁矿资源是

工业革命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一个岛国,英国各地的工业化发展比较均衡,如启蒙学派所在的苏格兰、威尔士、曼彻斯特、米德兰兹、东安格利亚、伦敦等地各有蓬勃发展的主导产业。作者指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工业化上的表现是创新和仿效之间的差别,认为引领创新的风险偏好和创新能动力等要素,在有效实现了公民自由和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才存在,极权政府领导的国家只有几个开始了仿效,事实证明大多数是不可持续的。

作者比较了三个比较成功的欧洲经济体。当时的比利时拥有与英国最接近的资源禀赋,和英国模式类似,最早发展的也是纺织业和采矿业,其他产业依次发展,并拥有先进的金融业。到了1840年,比利时已经成为欧洲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并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拥有不比英国逊色工业化先决条件,但文化普及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贵族阶层更缺乏商业意识,君主政体更集权化。法国大革命和之后的长期战争使得法国被隔离

在英国式的创新之外,发展落后,更依赖土地和农民,对经济的干预导致资源配置被扭曲。另外,法国没有像英国那样丰富、品位高的浅层煤矿。德国在18世纪还有400多个“独立小国”,1871年统一之后才实现了迅速、持久的经济起飞。但是德国拥有大量的煤矿资源,很快成为电力、化学、钢铁等重工业领导者。德国创办了很多股份制银行,比英国银行有更多的创新经营方式,为工业提供了大量资金。但是德国的工业化发展不均衡,西部有许多特别发达的地区超过了英国类似地区,但是东部地区较落后,拖累了整体发展水平。

作者还分析了俄罗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业化。俄罗斯疆域更宽广,因此地区发展差异更大,尽管在一战前生产的钢铁和电力与法国相当,而且拥有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更长的铁路线,其人均水平却跌入落后国家之列。作者指出俄罗斯深受东方式极权主义的影响,彼得大帝首次从西方引进技术,但并没有尝试去改变国家的体制,以实现经济结构的现代化。俄罗斯的农奴制废除时间较晚,

且没有很快实现农民自由流动和土地自由耕种。俄罗斯的工业化主要发生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乌拉尔、乌克兰等地区。俄罗斯的企业家很少,而且社会地位被边缘化。俄罗斯因加入一战而使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西班牙的气候、土壤等造成了较差的资源禀赋,受教育程度较低,只有少部分地区进行了工业化,其经济在内战和弗朗哥政权不切实际的自给自足政策的指导下备受打击。一战爆发前,西班牙的人均收入水平与意大利相当。意大利的资源禀赋更明显,一战后的财政体制跟不上实际发展需要,公共债务居高不下,金融业态较落后。意大利工业起飞较晚,持续时间短,但生产的电力和法国一样多,整体上仍相当落后,人均收入只有英国的一半不到。

广义讲,欧洲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也属于禀赋范畴。欧洲从13世纪就开始探索机械驱动,比如机械钟的出现,作者认为,除了航海技术,这是财富创造的另一个基础条件。可以看到,曾经的欧洲霸主,从葡萄牙、西班牙开始,到荷兰、英国,都是借助航

海技术获取更多资源、市场和财富,它们也是大航海时代的佼佼者。而机械技术应用也很快就超越了水利灌溉,早在17世纪就应用在了纺织上,蒸汽机的原型(蒸汽泵)也开始用于采矿。经过近百年改进,瓦特研制出第一台蒸汽机,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引擎。

对于中国过去的发展,作者也进行了分析。在区位上,中国和欧洲一样拥有广阔的海岸线,而且在15世纪拥有最先进的航海技术。但是,中国的体量使其更青睐发展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缺乏海外冒险动机。同时商人阶层缺乏政治权力,包括最大的海外贸易活动,都是由上而下推动的,商人既不是这类商业活动的主体,也没能促进商业的发展。基于对不发达国家的研究,作者认为须从历史的惯性和故步自封于传统才能得到答案。这些国家即便出现了被证明可行的有利的制度创新,仍然因循守旧于早期发展的特定模式,导致了随后而来的衰落。只有破除制度惯性和路径依赖,才能摆脱历史周期律。

(作者系深圳经济学家)



【市场盘点】

多元支付不仅革新了支付模式,也为消费者多样化的选择和全球金融可持续发展铺平了道路。



【磊哥说书】

在特定自然禀赋下,制度和经济政策对各国工业化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